

# 从知识精英到政治精英

## ——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轨迹和思想历程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十月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苏维埃政权刻意塑造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模板”。但两者在各自身份、社会职能和政治影响力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高尔基一直扮演着“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和知识界领袖角色的话,卢那察尔斯基则完成了从“知识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角色转变,在苏联早期的文化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卢那察尔斯基;造神论;文化革命;苏维埃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51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1-0228-08

十月革命与其称其为短暂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置于历史长时段视野下观察其“文化革命”的漫长轨迹。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文化决裂乃至文化重建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旋流暗结并且结果复杂。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被改造者和创造者。“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双重角色,知识分子和教育人民委员的双重身份,使得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前和革命后短暂的人生中经历了不平凡的政治轨迹和更为复杂的心路历程。

### 一、激荡的早年思想:“造神派”和“造神论”

卢那察尔斯基于1875年11月11日出生于波尔塔瓦的官僚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当时俄国社会颇为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小组活动。1895年中学毕业后,卢那察尔斯基赴瑞士苏黎世大学自然和哲学系学习。在此,他结识了刚刚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查苏利奇民粹派领袖拉甫罗夫以及波兰共产主义者罗莎·卢森堡。

青年时代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但是在政治信任和政治主张方面颇为活跃。他与俄国各派社会主义组织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但经常因政见不和而改换

门庭。1895年,他在国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7年返回俄国并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成员。1899年返回俄国,从事宣传和文学活动,被捕并流放到沃罗格达,结识了文艺理论家波格丹诺夫、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列夫佐夫和社会革命党领导萨文科夫。1904年因沙皇政府的追捕而流亡国外,根据列宁的建议,他在日内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部工作,用沃依诺夫的笔名发表政治论文。1905年秋天,卢那察尔斯基受列宁指派返回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编辑部,他很快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编辑工作得到了列宁的好评,随着《新生活报》社会影响的扩大,沙皇政府开始注意这个报纸,几个月后卢那察尔斯基再次被捕和流放。1906年秋,卢那察尔斯基再次成功脱逃。在1907年与列宁一起被选为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大会的俄国代表。同年,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发生变化,他主张通过合法方式与沙皇政府斗争而与列宁等人产生重大分歧,他因此宣布脱离布尔什维克,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温和派——“前进派”。在此期间(1907—1911),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方面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段的摇摆,显示了他的文艺先锋和知识精英的个人特质。其主要活动是积极参与“造神派”团体和推动“造神论”,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宣传理论和回应改造俄国现实的理论需求。

曾经带给俄国知识分子无限希望的1905年革命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俄国社会这一特殊群体。精神的幻灭伴随着信念的死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起。<sup>[1]</sup>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

收稿日期:2009-10-20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6—2009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NCET)资助项目“苏联政治文化谱系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望的结果。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sup>[2]</sup> 1905年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刻,卢那察尔斯基身在国内,亲身体验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却又感受到了革命浪潮的退却和俄国“铁血首相”斯托雷平的暴政。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卢那察尔斯基与布尔什维克暂时分道扬镳,试图脱离压抑的政治风暴,回到他所熟悉的哲学和宗教领域,通过学术思考以达到思想救国的目的。卢那察尔斯基与巴扎罗夫、高尔基、尤什克维奇和波格丹诺夫等人举起了“造神论”大旗。卢那察尔斯基作为“造神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05年完成的《理查德·阿芬那留斯、阿·卢那察尔斯基对纯粹经验批判的通俗叙述》、1908—1911年完成两卷本的《宗教与社会主义》,以及1908年与波格丹诺夫、高尔基、巴扎罗夫合著的《集体主义哲学概论》之中。

卢那察尔斯基在1904年完成的《实证美学概论》和1905年完成的《批评和辩论草稿》就已经表现了他对历史的客观逻辑的独特看法。他认为,主要是人的追求给予社会进步最高的价值,人使生命得以充分发展和提升。他认为,追求完善是“宗教的灵魂”,使生命之花常青的行为就是“宗教行为”。既然生命有着极高的价值,那么就意味着作为绝对生命坚信的进步思想就是宗教的起点。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解,费尔巴哈把人类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高的唯心主义价值,也即所说的宗教价值”<sup>[3]</sup>。

卢那察尔斯基清楚地理解了俄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群众意识的状态,即当旧制度行将崩溃之时,新制度的前景却模糊不清。此时,不太精致的宗教信念就成了大众力量反对现存制度的丰富资源。人民大众从“末日论”中汲取个人信念和创造力,正是“末日论”给予人民大众进取精神和破坏现存制度的热情。而这一品质在革命中是必需的,人民大众要在自己心目中的“上帝”引导下推动社会发展。在这一点上,卢那察尔斯基与“寻神派”代表人物别尔嘉耶夫有了相似之处但又有所区别。别尔嘉耶夫认为神人类就是永恒时间中的象征,而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人类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上帝,“在这里,现在,立即并且一起”开始建立地球上“上帝之城”。

卢那察尔斯基坚信,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个人自由意识为人类的幸福开辟道路。在他看来,神人类不是“完全地和成排地”可遇的人,而是拥有“创造潜力”和一切可能的人。在这里就需要“新宗教性”。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新宗教”人的特点在于:第一,个人整体发展的追求。这种追求只有在无产阶级创造的集体和社会中达到。第二,对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只有在共同的集体活动中才能实现。作为人的生命的最高理想的幸福的实现引导人们争取社会主义,因为在那里人们相互帮助并且快乐相处。第三,对实现某种社会

的和有益东西的价值的追求。“共同劳动中的需求”和“伟大的情感”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

卢那察尔斯基在《道德问题与美捷林克》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真正的集体主义宗教”赋予人类以责任。他写道:“人的组织在这里联合为某种正义的、完整的东西,而主要的是在个性上和个人方面联合为一个整体。‘我’清楚地和直接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大的‘我’的欢乐和自豪。‘我们’是由自然的、种族的团体中孕育而生并且共同生长。它逐渐为部落、城市和民族所包围,最后所有的人类演变成各种团体:家庭、教派、政党等等。它数千次地增加着外表的感受,‘我们’只有经历几个世纪的‘小我’死亡之后才能感受到胜利的喜悦。”而“我”永远身处拥有“宏大心理和博大胸怀的个人”的“我们”之中<sup>[4]</sup>。

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富有思想性地解说为通过实践的途径,即“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共同劳动”;通过情感,即“对待种族、历史等共同的欢乐感、团结感和正义感”。作为“真正的人类文化”基础的全人类劳动组织问题解决的必要性决定上述关系的克服和协调。

在一段时间里,高尔基也加入造神派并在理论上与卢那察尔斯基保持了密切合作关系。他在回复《法国的墨丘利》杂志的问卷中把宗教情感看成是“个人力量中复杂的创造信念感觉”,而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与过去和将来相关联的宗教情感。他在1908年完成的《忏悔》中,对待宗教真理寻求者的类型——造神派看成是类似约那或者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圣者。他赞成创造一个新的上帝,“美丽、智慧、公正和博爱的上帝”,上帝鲜活的情感将“在每一个人在各个方面的精神属性的美好的意识的火焰”中产生,“造神论”永久的源泉就是“地球上的劳动人民”。由于人民意志的苏醒和现在分散的土地上力量的联合,“地球上包罗万象的上帝光明地和美好地诞生了”。这个上帝创建了不可胜数的世界人民,“坚信他的精神、信任他的力量。他是唯一的和不容怀疑的生命的开始,他是过去的和未来的所有的上帝之父。”<sup>[5]</sup>

“造神派”的其他思想家也认为,宗教信仰应成为人类团结和联合起来的道德理想,无产阶级也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卢那察尔斯基宣称:“社会主义者是更宗教化的旧信仰的人们。”<sup>[6]</sup>他们宣称只有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如果把宗教变成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崇拜,那么社会主义理想就不但能够被工人阶级所理解,也能被半无产者、小资产者和农民所理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宗教,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卢那察尔斯基曾说:“社会主义就是新的宗教,它是人类为了使自然完全服从理性,为了取得胜利,为了集中力量而进行的同自然的有组织的斗争。”宗教是道德和美学的理想,宗教感情是人类固有的永恒的感情。他们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严密的宗教哲学体系,就是人类“最后的伟大宗教”,马克思就是新宗教的伟大先驱,它将引导人们走向

物质和精神的新生活。工农联盟是新教会的奠基石,而具备了宗教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容易被广大群众信仰并积极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造神派认为别尔嘉耶夫等“寻神派”刻意追寻的“神”——上帝实际上并不是客观存在,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精神偶像的。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用集体的力量“造”出一个“神”作为人们共同崇拜的象征。波格丹诺夫主张的“集体主义哲学”是造神派的一个理论来源。社会主义者崇拜的现实偶像就是人们的集体和宇宙。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论路标》、《给阿·马·高尔基》、《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论的派别》和《我们的取消派》中批判了造神派。列宁认为“造神派”和“寻神派”在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目的。因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俄国,任何的、甚至是最精致的、最正统的为上帝思想的辩护和证明都是反动的辩护。”<sup>[7]</sup>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悲惨命运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信奉上帝和神是他们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普列汉诺夫对“造神派”亦持批判态度,他在1909年发表的《论俄罗斯所谓的宗教探索》中称“造神派”为“承受不住1905—1906年打击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无袖短衣”。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论,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造神派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在列宁的严厉批评下,卢那察尔斯基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主流思想的差距。他于1912年脱离“造神派”和“前进派”,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1914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论及文学史,第一次谈及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完全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特别在文化革命之中。在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作为“区联派”代表在组织上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

## 二、十月革命时期的思想游移

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前的一些著作中仍然保留着“造神论”的影子,他在1917年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文化任务》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哲学”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无产阶级群众的“生命的智慧”,通过宗教的追寻而达到生命的完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走进地球上的应许之地”的方式,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摆脱依赖、自然和跨自然力过程中寻找真理的顶点。集体的、共产主义的不朽思想具有基督教思想的普遍意义,它将增加社会主义拥护者的数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身居国外的卢那察尔斯基保持了国际主义的立场,即批判战争的反动性,渴望俄国革命的爆发。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日内瓦集会上表示:“俄国应该现在利用政府的混乱和士兵的疲惫,在革命的帮助下发动彻底的变革。”<sup>[8]</sup>但是当他听到二月革命爆发和沙皇制度被推翻的消息后仍然相当震惊。卢那察尔斯基将妻子和儿子安置在瑞士,于1917年5月9日随第二批政治侨民从瑞士只身返回俄国,加入与布尔什维克较为接近、但留有护国主义尾巴的中派组织“区联派”。他倡议成立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任主席职务。在6月11日的讨论军事问题会议,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主张,在六月危机中与布尔什维克保持密切关系。6月,他参加了高尔基创办的《新生活报》。随后与托洛茨基、科隆泰、加米涅夫等人一起被临时政府逮捕,从6月23日到8月8日关押在“十字”监狱里。

1917年7月5日,卢那察尔斯基在给瑞士苏黎世的妻子的信中谈到自己对7月危机的悲观态度,谈到对布尔什维克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的担忧,“我不得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我讲一些最不足轻重的维护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远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我在很多集会上已经预先警告过……脱离了民主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组织死掉了,显然,革命死掉了。现在勇敢在于启发群众克制着他们的极端情绪,这种情绪在彼得格勒已经比较软弱了,但整个死掉了的……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口头上赞同,但实际上却让步于自然发展。而我跟随他。”<sup>[9]</sup><sup>351</sup>8月20日,他被选为彼得格勒城市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领导人。同月,他到《无产者报》和《教育杂志》编辑部工作。1917年秋,他被选为彼得格勒副市长和文化教育局主席,同时被选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会议会议员。

此时期的卢那察尔斯基一方面为无产阶级代表昂首阔步进入临时政府而欣喜,另一方面为革命危机的到来而紧张。10月18日,卢那察尔斯基与同样反对急躁冒进发动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右翼布尔什维克联盟”。十月革命对于卢那察尔斯基来说是突然而至的,他认为拯救国家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本人所代表的“右翼布尔什维克联盟”的事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行为只能使国家走向恐怖。他在这一天给妻子的信中记录:“我们组成了某种布尔什维克右翼联盟,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我等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在他们那里——中央委员会,在我们这里,聚集了所有的负责如政府的、工会的、工厂的、军队的和苏维埃的工作的领导者。”<sup>[9]</sup><sup>43</sup>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0月18日在《新生活报》公开发表反对武装起义的谈话之后,彼得格勒出版的右翼报纸《交易所公报》也出现一篇文章中透露卢那察尔斯基提供给临时政府警察局起义准备的消息。10月24日,《工人之路》发表卢那察尔斯基的声明,强调这个消息是虚假的。“如果谁提起这个问题,我就将逐字逐句地回

答托洛茨基在10月18日彼得格勒社会民主工党会议的声明(托洛茨基的声明是‘我们没有派出任何武装起义’。)[10]

10月25日,卢那察尔斯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紧急会议,当晚被选为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批驳了退出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武装起义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问题上的转向的无奈原因,“从政治上说,我当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对于我来说极其明白,除了政权转向苏维埃外对于俄国来说没有其他的拯救。是的,还有一条路,即纯粹的民主方式,即形成列宁—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唐恩—维尔霍夫斯基阵线。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所有方面的和平情绪和政治智慧,因此显然,这是幻想。如果根据理智的布尔什维克立场召开执行会议,可能在上述人物参加社会民主政府,尽管困难极大,但这是最好的出路。”[9]45在10月27日信中,卢那察尔斯基告诉妻子:“对于我来说,它(即政变)并不突然,我当然清楚,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将获得胜利,但是政权在代表大会前夜获得,却是我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似乎,甚至革命军事委员会决然发起进攻是突然的政变从一方面来说是意外的礼物,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导致了可怕的和危险的状况。重复一句,再有几天就到头了。民主联盟可能是出路,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拥护民主联盟。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反对。……护国主义分子很少有可能走向妥协,就像我们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9]45-46

随后,卢那察尔斯基立即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大规模毁坏著名的历史纪念碑而痛心,他立即投入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在10月29日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对新政权在“文化上”的政策失误的担忧,“一件事很明显,我们从政权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们不能修复任何东西。社会主义者聚集在纯粹的民主政府之中?天知道!但是除此之外,似乎,除了为革命而死亡外,什么都没有。因此我深深地没有感受到任何措施的实行。例如,不仅长时间禁止资产阶级出版物,而且禁止了社会主义出版物(根据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法令)。”[9]47与此同时,高尔基也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开设《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猛烈批评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11]。

### 三、在教育人民委员岗位上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中,在紧张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国际斗争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认识到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苏联早期文化政策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前线差不多业已平静。当前需要进行长期而顽强的工作,而首当其冲的是文化工作,没有它,就不可能达到普遍的经济高涨。”[12]

由列宁提名,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

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成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首任人民委员。1918年6月26日,列宁签署《关于俄罗斯共和国国民教育事务组织》,进一步确定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能,即负责教育、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政策的实施和行政管理。1922年12月30日苏联宣布成立,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

十月革命后以及新经济政策实施的20年代,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俄共(布)内部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另一种倾向的代表者是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文化派”来自于卢那察尔斯基1917年5月创办并领导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卢那察尔斯基在“造神派”时期的同道者、文学评论家波格丹诺夫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波格丹诺夫主张对待文化遗产“应该像信教的人对待异教一样”,无产阶级文化是“没有任何异己的杂质”。“无产阶级文化派”排斥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拒绝非无产阶级出身或政治上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理由是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13]

“拉普派”是1920年10月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的别称。“拉普派”视一切未加入或接近拉普的知识分子为异己分子,冠之以“资产阶级作家”、“路标转换派作家”、“新资产阶级作家”,进行文学上的刁难和政治上的围攻。对拥护和服务于苏维埃政权,但反对拉普路线的知识分子,则冠之以“同路人作家”、“同路人知识分子”、“暂时的同路人”、“新同路人”、“改造时期的同路人”。“拉普派”认为只有工人作家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情绪。1931年“拉普派”提出了“不是同路人,要么是同盟者,要么是敌人”的口号[14]。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吸引各种不同政治思潮和文艺派别的知识分子为新政权和新思想服务。在他所创办的杂志《火焰》周围联合了不同派别和主张的作家。他试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拉普派”的极“左”路线采取不干涉态度。他认为:“教育人民委员在对待各个艺术派别上,应该是公平公正的,至于形式,教育人民委员和政权的所有代表不应去注意,应该赋予所有艺术派别,艺术团体自由发展的权利,不让一个流派排挤掉另外一个。”[15]213他在《无产阶级文化派和苏维埃工作》中强调政治领域中的党、经济领域中的工会、文化领域中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应该平行的关系[15]218。列宁严厉地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理论上不正确在实践上是有利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尝试臆造虚构自己的特别的文化,局限在自己的孤立的组织之内。”[15]218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的引导下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一不断演变的极“左”思潮。他与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在1922年10月到11月的《真理报》上发表了10多篇与无产阶级文化派论战的文章,引发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党内大论战。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极为棘

手的问题。大量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离心离德,站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之上。卢那察尔斯基看到知识分子“用凶恶的憎恨对待我们”<sup>[9]50</sup>。但是,作为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行政长官的卢那察尔斯基没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式和“拉普派”式的态度,也没有简单地采取行政命令和政治整肃的方式对待“旧”知识分子,而是利用与这些人的旧交动员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和思想上主动转变,更多的时候是利用拥有的特殊权力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为解决部分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极其困难的生活状况以及窘迫的研究和创作条件,1919年12月23日全俄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善科学家状况》法令,1921年11月10日成立中央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部在卢那察尔斯基的领导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善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1920年2月,由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主席,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定改善教师物质条件的措施。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艺术家库斯托季耶夫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学教授格罗斯曼,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为著名演员扎库什尼亚克提供医疗条件,为他治疗疾病,提高教授医生戈卢博夫的退休待遇等。

著名诗人勃洛克旧病复发,病情严重,需要出国治疗。1921年年7月8日,卢那察尔斯基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写信,说明:“因为勃洛克现在患有严重的坏血病,并且引发心理崩溃,因此担心心理疾病加重。我们简直说不允许诗人出国和不给他提供必需的令人满意的条件,而是折磨他。这个事件本身将被我们的敌人所利用。在这里我没有错误是因为,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拒绝无论是像勃洛克,还是其他的类型的作家的出国申请,支持他们的所有请求。但是无论是在彼得格勒粮食部门和苏维埃机构,同样地在契卡特别部,我要么是被直接拒绝了,要么是一贯地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例如,对于科学界)。因此在俄国和欧洲的社会舆论面前,我首先对类似的现象负有责任。因此我再一次以极大的热情对有关部门以漠不关心态度对待俄国著名作家需求表示抗议,并且再一次以极大的热情请求迅速批准勃洛克赴芬兰治病。”<sup>[16]22</sup>

1921年7月16日,卢那察尔斯基再次给俄共(布)中央写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和情绪:“通报给我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勃洛克和索洛古勃的决定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误会的结果。做出决定是困难的,它的不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为世人所见。……勃洛克何其人也?是蕴涵巨大希望的青年诗人,像昨天所说的,他与勃留索夫和高尔基一起构成我国文学的精华。不久前《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称勃洛克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并且强调他承认和赞颂十月革命。……我复制这封信并寄给关心勃洛克命运的列宁和高尔基同志,为的让俄国最著名的作家们知道(请中央委员会允许我这样表达),在这个轻率的决定中我没有任何过错。”<sup>[16]28</sup>

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请求之下,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给反对勃洛克出国的俄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写便条,“我和列宁建议:考虑勃洛克出国问题。在过去的表决中,托洛茨基和我同意,列宁、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反对。现在列宁转向我们了。”<sup>[16]29</sup>卢那察尔斯基建议莫洛托夫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在随后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并表决的勃洛克出国问题,其结果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投赞同票,莫洛托夫投弃权票,季诺维也夫反对,最终决议得以通过:“批准勃洛克出国。”<sup>[16]29</sup>但是此时这个决议对于病入膏肓的勃洛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5天后,1921年8月7日勃洛克在彼得格勒病逝。

学者借出国演出或学术交流的机会长期滞留国外,这是让卢那察尔斯基颇为头痛的事情。因为他清楚,作为一个内行的主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政府负责人他不能拒绝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请求,但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他必须为此承担领导责任。1921年5月31日,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申请政治局通过了批准俄国著名歌唱家和导演夏里亚宾出国。然而,夏里亚宾一直滞留法国和美国。1921年8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剥夺夏里亚宾“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的决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要求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此类出国申请严格控制并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做出批准或拒绝的决议。捷尔仁斯基对卢那察尔斯基温和的知识分子政策素有不满<sup>[16]15-16</sup>。

1921年5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要求卢那察尔斯基提交申请出国人员的准确表格和证件,统计已出国的学者和艺术界人士回国的数量,“将所有资料寄达全俄契卡特别部用以进一步的考察。”<sup>[16]16</sup>卢那察尔斯基按照要求准备文件,并且提出了关于艺术家出国程序的建议:“给所有申请出国的演员由主管艺术委员会排列出顺序,允许其中的3—5人在声明后出国,即再出国者必须等到以前派出者回国后方可成行。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一个自然的和圆满的保证。派出将只根据演员的申请,通过工会或者当地公社,因此如果5人中的1人滞留国外,他们自身就将有罪,因此,他们就自动地堵上了出国的大门……”<sup>[16]17</sup>然而,最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5月28日作出决议:“第一艺术工作室的出国申请被拒绝”<sup>[16]19</sup>。

十月革命后有200多万俄国人移居国外,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侨民俄国”。卢那察尔斯基清醒地认识到侨民中相当多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享有世界声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离开苏联,因此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卢那察尔斯基经常收到他们辗转来的信件,表达希望返回祖国的愿望。卢那察尔斯基在1925年4月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国外的俄国侨民中有大量的天才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世界性荣誉,例如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这些人绝对不反对我们。我收到过他们的许多信件,表示愿意与我们建立联

系,他们离开祖国并不情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很高兴地返回俄国。”<sup>[17]</sup>经过卢那察尔斯基长期的工作,著名演员叶莲娜·苏哈切娃决定返回祖国。她1925年11月14日从君士坦丁堡给卢那察尔斯基写来的信中所言:“当我离开俄国时,您曾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返回俄国。我想返回舞台,把给您的电报发给教育人民委员部,除此外,没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当地的领事馆就不会给予我任何帮助。”<sup>[18]</sup>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文化和文艺政策应该张弛有度,不能过分严厉而违背文化和艺术规律。1927年,关于对艺术生活和创作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方式和程度问题在俄共(布)党内曾经引发激烈争论。来自极“左”方面批评意见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艺术领域缺乏清晰的政策。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剧院监督委员会主任布留姆举例说明莫斯科模范剧院经受着来自党的官员的折磨。卢那察尔斯基予以回应:“艺术领域的国家政策完全不应该特别严厉,因为对艺术会走到相反一面对于所有居民来说变成公开的仇视艺术。”他认为当前艺术的特点是“处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的特殊性和分散性状态之中”<sup>[19]</sup>。

在高等和中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他认为,革命前的学校是反人民的,是毒化人民意识的工具,为保护专制的国家体制服务,是令人厌恶的忠于君主制的工具。学校是社会的先锋队。从学校里走出的人是什么样的,那么社会就是什么样的,学校应该是属于人民的。革命前中学的大门没有对所有阶层的学生敞开,当时的制度不适用于劳动人民。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国家需要专业人才。从一定年龄起,在保留基本课程的基础上划分学习小组,如数学、物理、生物学等等。他大力强调个性化教学的必要,从教师的角度让每一个学生的个别的要求同自己的志向和特点一致。尽可能充分的个性化教学是学校革新最重要的原则。卢那察尔斯基在视察一所幼儿园时,就提出过,“称赞能培养一个人,有时驱使他做出奇迹,使他变得坚强。这样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学生,适用于对待身边的人,但也不能概括所有情况,人是非常复杂的,要用个体的方法。……教育过程——是非常困难的过程,应该明确,你有什么目标。如果人们弄坏黄金,可以重新浇铸,改铸;如果宝石被破坏,就成为废品,但即使是最名贵的宝石,在我们的眼中,都没有成长着的人宝贵。当人犯错时,要清楚的研究,但首先要明确目标,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sup>[15]200</sup>

教师是实施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关键,是苏维埃文化的创造者。对于知识分子中的教师,列宁指示:“他们是全苏联的教师,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程度很高,是开明的人,是群众的引路人,文化的传播者;无论在城市,农村,都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你要区分他们,帮助那些积极的教师出人头地,关注教师走上领导岗位的正常升迁,使这部分最积极的分子成为自己的支柱,吸收他们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到人民委员会。当然,在各种各样的专家和教

师中有反动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则应该和他们斗争,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斗争,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可以被我们说服改变原来的看法。为了我们思想的正确性和胜利,应该使摇摆不定的教师从敌人的影响下解脱出来。”<sup>[15]198</sup>卢那察尔斯基一直谨记列宁1923年1月两次生病期间日记中的一段话:“我们应该这样看待人民教师,他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也不会站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个真理不需要任何证据。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坚定的始终不渝的工作,心灵的热情,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sup>[15]198</sup>

随着列宁去世后党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党政权力逐渐向斯大林手中转移,卢那察尔斯基越来越远离拥有实权的领导岗位,他没有参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论战,尽管他与托洛茨基一直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卢那察尔斯基批判人类灭亡和恐怖的作品被斯大林下令禁止出版,他认为自己已经得不到斯大林的充分信任,包括在出国访问问题上要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在晚年,卢那察尔斯基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冲突。他反对教育管理的过分机械化,他主张要实行全面的平衡。1928年2月,卢那察尔斯基给斯大林写信,反映在高等学校招生时歧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的现象。他认为不能仅仅按照社会出身就停止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29年卢那察尔斯基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几位同事拒绝参加为“文化革命”欢呼鼓噪并扬言辞职,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改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和学校委员会主席。由长期从事军队和政府高层政治管理工作的俄共(布)中央书记布勃诺夫接替了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严酷的行政路线”。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在苏联和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苏联政府没有公开批判他,而是采取了“光荣流放”的做法,但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和体制间的保护人和中介者。”1932年卢那察尔斯基在柏林做了右眼手术,在返回苏联时仍然无法正常工作,同年不得不再次赴德国治疗。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在赴任去马德里途经法国小城芒顿时去世。

#### 四、卢那察尔斯基思想肖像

卢那察尔斯基在其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和十月革命后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走过了不平凡的政治轨迹和更为复杂的心路历程。同高尔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是苏联早期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标本。

早年的卢那察尔斯基经历了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的多次游离,充分体现了19世纪以降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质。

作为文艺先锋人士的卢那察尔斯基亲身体验了十月革命前自19世纪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

代”的繁华旧梦。这一时期最为繁荣和引人注目的是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思潮,如象征派、颓废派、前阿克梅派、阿克梅派、自我未来派、未来派、立体未来派等。在此潮流之下,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展开积极的探索。1902年,由白银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著名文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著名诗人吉皮乌斯倡议,在彼得堡建立了“宗教与哲学协会”。象征主义诗人伊万诺夫的家中成为寻神派活动中心,聚集了俄国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如著名哲学家明斯基、罗扎诺夫、菲洛索福夫、画家列宾等人。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领导了莫斯科的“宗教与哲学协会”,别尔嘉耶夫在基辅的“宗教与哲学协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称他们为“寻神派”,称他们的学说为“寻神论”。作为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的卢那察尔斯基是“白银时代”俄国文艺思潮风云变幻中的弄潮者,他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与上述派别和人士保持了长久的和密切的关系。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以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得他习惯于将社会问题与艺术问题混同,将政治问题和个人志趣混同,将革命浪漫主义与社会现实主义混同。因此,在回答1905年革命后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发动问题之时,特别是在革命浪潮急剧低落之时,他打出了“造神论”的大旗,宣布将社会主义看成是“地球上的神圣王国”,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集体主义的宗教哲学”,并相信它将在俄国这个“农民——基督徒”为主的国度里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并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武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将“造神派”和“寻神派”视为被1905年革命吓坏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隔夜呓语,视为知识分子对革命和人民的背叛。其实,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代表的“寻神派”与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代表的“造神派”在本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正如苏联学者拉斯科瓦娅所言:“如果说‘寻神论’以极紧密的方式与反动阶级相联系的话,那么‘造神论’则是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显现”<sup>[20]19</sup>。“寻神派”着眼于“出世”和“避世”,在政治思潮上属于自由主义阵营,而“造神派”着眼于“入世”和“革命”,在政治思潮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属激进主义阵营,只是如何发动群众和发动革命的方式上与列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存在根本分歧。“‘造神论’拥有自己的社会根源,即它首先寻找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年代形成的阶级力量”。“如果把‘造神论’看成是宗教学说,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它的现代化和精致的特点,注意到与其斗争的复杂性和揭露它的本质的困难性”<sup>[20]19-21</sup>。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论”实质上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极端体现,只是在方法上陷入了不切实际的窠臼,显现了他一人身上知识分子与革命家双重角色的困惑。

卢那察尔斯基是由旧俄知识分子转型为苏维埃知识分子、由知识界入政界、由知识精英转为政治精英的成功

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从一定意义上讲,卢那察尔斯基也是知识分子中担任政府管理职务最高和时间最长的一位。

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称自己仅46年的一生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他在考察曾被她称为“乌托邦”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苏维埃文化得失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视角,而得出的结论也更发人深省。在葛兰西的政治学和思想武库中“文化领导权”理论占据重要位置。葛兰西将文化在新国家和新制度初立时期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职能凸显出来,即统治者借助于文化手段影响并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其服从于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葛兰西解释说:“它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sup>[21]</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十月革命是作为一场影响更为深远、过渡更为久长、内容更为复杂的“文化革命”,即是布尔什维克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行为。正是有鉴于此,仅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苏维埃政权属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宣告成立,并且列宁为该人民委员部选择一位内行的行政首长——卢那察尔斯基。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卢那察尔斯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卢那察尔斯基被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的文艺理论学家和文化问题专家。他在担任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期间仍然写了大量的文学、音乐和戏剧方面的文章。如1918年创作的剧本《浮士德与城市》和《天堂中的伊万》、1919年创作《祭司》、1920年创作的剧本《克伦威尔》、1921创作《大臣与钳工》、1922年创作剧本《托马斯·康帕内拉》和《引诱》、1923年创作剧本《解放了的唐·吉珂德》以及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最后一部论著是《高尔基》。而且根据俄共(布)在大学中“共产党化”的要求,卢那察尔斯基与其他党的活动家列别什斯基、阿多拉茨基、库尔斯基、斯柯沃佐夫-斯捷潘诺夫到莫斯科大学和俄共(布)中央红色教授学院去担任教学工作。1930年,卢那察尔斯基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从十月革命初年起,整个20年代苏维埃社会都一直存在着—股极“左”文化思潮。这股文化思潮的特点是,鼓吹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文化”;否定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唯我独左,不要党的领导,推行宗派主义的文化政策,打击和排斥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艺术家;在理论上主张纯而又纯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这股极“左”文化思潮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初,经过20年代的发展变化,绵延影响于30年代。

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分化,

相当多的人士采取了与新政权不合作乃至敌对的态度。而苏维埃政权急于完成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军事共产主义”冲击,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文化革命”的艰巨使命。面对知识分子的离异思想和行动,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习惯于“红色恐怖”下政治整肃和行政规训的方式对待,因此作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可贵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以较温和态度对待旧知识分子,试图吸引其为新政权服务,并且尽力维护知识分子的利益。十月革命前曾经与卢那察尔斯基长期共事,十月革命后分道扬镳的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回忆:“这个时期很多的作家都前往克里木,在那里可以经常遇到艺术的保护者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代表、作家、学者的态度与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不相符的,是另一样的。比起肃反委员会来,他们在排挤俄国知识分子方面显得不好意思和腼腆。”<sup>[22]</sup><sup>216-217</sup> 他也提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俄共(布)领导人加米涅夫:“应当说,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的加米涅夫,一直是很关心并保护学者和作家的。为了保护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做了很多事情。”<sup>[22]</sup><sup>218</sup>

但是,正是卢那察尔斯基的特殊身份迫使他常常是以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面目出现,从而招致他人非议。作家兼剧作家安德烈耶夫在1919年9月9日写给记者布勒采夫的信中极其苛严地谈及他对卢那察尔斯基的印象:“布尔什维主义大规模地毁灭了受教育的人们,灭亡他们的肌体,用自己的贿赂——喂养体制消灭他们的道德。掩藏着自己狡猾的尾巴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些可怕的猎犬中要比其他人更可怕和更坏。他是懦夫和洁癖者,他想保留礼貌的外表,于是使人看不清。每一个新的‘名字’,每一个教授、学术知识分子或普遍的正派人都相应地压缩着他个人的责任。如果说连尼禄都曾多次表达热爱艺术的话,那么作为他——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创造任何的黄金时代、艺术家和导演的天堂,与黑色的契卡相反的是,天堂给了卢那察尔斯基一个特别的文质彬彬的外表。黑暗王国的一丝光亮,这大概是他自己这样想象自己的,因为除此外他是一个下流的和不太聪明的人。”<sup>[23]</sup> 因为,的确在卢那察尔斯基执政期间,苏联发生了大规模驱赶和镇压反苏知识分子的事件,他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的执行者,当然难逃其政治责任。

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生走过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迷雾,但他始终同俄罗斯人民同命运共患难,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为俄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他能充满自信和激情地说:“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多少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于他们的裁决没有丝毫的怀疑。”<sup>[24]</sup> 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的朋友高尔基给他评价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箴言:“您度过了艰难而光辉的一生,做了大量的工作。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生,您都同列宁和他的最伟大,最卓越的同志

们并肩走在一起。”<sup>[25]</sup>

#### 参考文献:

- [1] 赫克.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高骅,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4.
- [2]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 路标集[M],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1.
- [3]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Атеизм. [С]//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1908:140.
- [4]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Этюды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M]. Москва, 1906:175.
- [5] <http://feb-web.ru/feb/litenc/encyclp/le1/le1-5351.htm>[BD/OL].
- [6]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Религия и социализм:Т1[M],СПб,1908:45.
- [7]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 соч. :Т48[M]. Москва,1957:232.
- [8]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Т80[M]. Москва, 1971:627.
- [9]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J]. 1991,(2).
- [10] Революция 1917:Т5[M]. Москва, 1975:120-121.
- [11] 高尔基. 不合时宜的思想[M]. 余一中,董晓,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36,59.
- [12] Крупская Н. 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 К. Крупской образования[M]. Москва,1957:196.
- [13] 戈尔布诺夫. 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M]. 申强,王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102.
- [14] <http://www.oval.ru/enc/59761.html>[BD/OL].
- [15] Елкин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M]. Москва,1967.
- [16] Артизов А.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 - 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6) - ВЧК - ОГР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 - 1953 гг[G]. Москва,1999.
- [17] РГАСПИ[G]. Ф. 142. Оп. 1. Д. 460. Л. 8-9.
- [18] РГАСПИ[G]. Ф. 142. Оп. 1. Д. 646. Л. 1-2.
- [19] ГА РФ[G]. Ф. А - 2306. Оп. 69. Д. 843. Л. 4-5.
- [20] Ласковая М. 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о и 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M]. Москва,1976.
- [21] 葛兰西安. 论文学[M]. 吕同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 [22] 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识:思想自传[M],雷永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3]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J]. 1992,(6).
- [24] 卢那察尔斯基. 论文学[M]. 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26.
- [25] Ленин и Горький. Связ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и очерков[M]. Москва, 1969.

[责任编辑:那晓波]



## 历程

作者: [张建华](#)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刊名: [学习与探索](#)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TUDY & EXPLORATION](#)  
年, 卷(期): 2010, ""(1)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25条)

1. [赫克. 高骛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1999
2. [基斯嘉柯夫斯基. 彭甄 路标集](#) 1999
3.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Атеизм](#) 1908
4.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Этюды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осква 1906
5. [查看详情](#)
6.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Религия и социализм:Т1](#) 1908
7.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Т48](#) 1957
8.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Т80](#) 1971
9. [查看详情](#) 1991(2)
10. [Революция 1917:Т5](#) 1975
11. [高尔基. 余一中. 董晓 不合时宜的思想](#) 1998
12. [Крупская Н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 К. Крупской 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957
13. [戈尔布诺夫. 申强. 王平 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1980
14. [查看详情](#)
15. [Елкин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Москва 1967
16. [Артизов А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 1999
17. [РГАСПИ \[G\]. Ф. 142. Оп. 1. Д. 460. Д. 8-9](#)
18. [РГАСПИ \[G\]. Ф. 142. Оп. 1. Д. 646. Д. 1-2](#)
19. [ГАРФ \[G\]. Ф. А-2306. Оп. 69. Д. 843. Д. 4-5](#)
20. [Ласковская М 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о и 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Москва 1976
21. [葛兰西安. 吕同六 论文学](#) 1983
22. [别尔嘉耶夫. 雷永生 自我认识:思想自传](#) 2001
23. [查看详情](#) 1992(6)
24. [卢那察尔斯基. 蒋路 论文学](#) 1983
25. [Ленин Горький Связ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и очерков](#) Москва 1969

## 相似文献(1条)

### 1. 期刊论文 王志耕 造神运动:显性上帝向隐性上帝的转换 -外国文学2004, "" (6)

宗教文化作为制约性因素始终是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苏联时期的文学中仍保留着宗教的隐喻形态.这种形态有一个预言性标志:造神运动.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而高尔基则通过小说《忏悔》来形象化地宣扬造神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宗教,以替代历史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所要创造的上帝仍然不是人民大众本身,而是民众理想的精神归缩,即新的上帝,把显性的上帝变为了隐性的上帝.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xyts201001059.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xyts201001059.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8月17日